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发展报告
(1994-1995)

从传统向现代 快速转型过程中的 中国社会

顾问 袁宝华 李文海
主编 郑杭生
执行主编 李德顺 毛佩琦
欧阳志远(常务)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发展报告
(1994—1995)

从传统向现代 快速转型过程中的 中国社会

REPORT ON SOCIAL DEVELOPMENT
B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994—1995)

CHINESE SOCIETY IN FAST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MODES

顾问 袁宝华 李文海
主编 郑杭生
执行主编 李德顺 毛佩琦
欧阳志远(常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 (1994—1995):

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

主编 郑杭生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ISBN 7-300-02206-5/C · 148

I. 中...

II. 郑...

III. 社会科学-研究报告-高等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1994—1995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002 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 (1994—1995)

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

顾问 袁宝华 李文海

主 编 郑杭生

执行主编 李德顺 毛佩琦 欧阳志远 (常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2.25 插页 5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44 000 册数: 1—3 000

定价: 49.00 元

保持社会稳定，推动
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
会公正、安全、文明、健
康发展。

李文学

前 言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出版之际，我想谈谈与本报告有关的几种分析问题的视角，谈谈本报告写作成书的一些情况，作为本系列研究报告的前言。

中国社会现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之中。当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或那样地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快速推进中。

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40~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对于这些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或角度来加以分析。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分析视角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社会转型度”的视角。“社会转型度”是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可具体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上述三个阶段的区别，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问题，都可以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加以描述和分析。

就速度来说，第一阶段是低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则是高速发展阶段。从1978年执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也即进入第三阶段后，情况与以前有了根本不同。可以说，十多年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以前两个阶段约140年的总和。中国社会变化之巨大，速度之快，甚至连许多中国人自己有时也不敢相信；外国人如果不亲眼看看，也许以为是在听神话。当然在发展速度上有一个把握得当的问题，速度太慢不行，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后；太快了，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也会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这样势必又要回过头来调整。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多次经验教训了。在速度的把握问题上，我们应该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求快；而在战术的具体实施上从实际出发，能快到什么程度就快到什么程度，没有条件的地方要创造条件快速发展。

就广度来说，第一阶段的转型是相对片面的，先是上世纪的洋务运动，追求“船坚炮利”式的现代化，转型局限在器物层面上；后是上世纪末的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式的现代化，转型局限在制度的层面上；最后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追求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型又停留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在第二阶段，转型不是很全面、很广泛，中心放错了，发展战略有时不切实际。第三阶段的转型则是全面的，重点摆对了，发展战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从思想、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或部门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全面的，同时转型的时序又是不同的。它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经济体制改革着手，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政治体制改革跟在后头，从而达到相互促进，覆盖社会各个部门。从东西南北不同地区来看，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同样是全面的，同时又是递次推进的，这就是由东到西，由南到北。1978年中国决定在沿海地区建立14个开放城市，开始推行沿海发展战略，并由华南经济区推动华中、华北经济的发展，这是由南向北的推进。中国又实行从上海至重庆的沿长江推进的沿江发展战略，由华东经济区推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这是由东向西的推进。中国还实行沿国界发展的沿边发展战略，使中国社会转型涉及到最遥远的边疆地区。当然，在谈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性时，也不能不注意它的不平衡性。首先是地区间的不平衡，沿海和沿江发达地区（转型的优势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转型的劣势地区）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发达地区实力的增强，如果税收不完善，削弱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将使中央相对集权与

地方合理分权的正确原则得不到切实贯彻。其次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例如教育部门由于投入不足，教师待遇低下，本来应该具有优势的部门却成了劣势部门。第三是群体之间的不平衡，拿收入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群体间差距过大，而群体内差距过小这两种现象，这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两种形式。

就深度来说，与以前不同，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深层。

首先，它涉及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从1978年底以来，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一系列将人们区分为不同身份群体（如阶级身份、户籍身份、就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的次级社会制度，构成了一种弹性很低的社会结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身份取向在日益弱化，由这种身份取向而导致的刚性社会结构正在向弹性社会结构转化，社会地位的开放性大大增强。它们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集中表现之一。同时，随着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中国从社会流动率和社会分化率很小的社会转变为较大的社会，并进而引起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广泛转型。第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改革前，中国由中央政府集中计划分配、管理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进行实际运作。当社会普遍单位化时，社会资源也随着单位化了。任何个人或单位，如果脱离国家的计划，自主活动和开发资源，一般不具有制度上、声望上或名义上的合法性。十几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1）中央的资源控制权力下移，资源供应能力削弱；（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3）“体制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自由流动资源大大增加；（4）农村组织的社会控制功能弱化。第三，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个人自主选择增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这种变化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人们看到，社会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因而，便不再有一种集中的向“国家”靠近的冲动。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开始自主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机会。

其次，它还涉及价值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从内容上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在义和利、个人和社会等方面的价值观念，正从过去轻利重义向既重义又重利的观念转变，从过去轻个人重社会向既重个人又重社会的观念转变。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形式上说，这种变化就是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而在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基础上，人们价值观念的演变又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就职业价值观念而言，国内多次调查表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实现和经济利益并重。这种种变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自主选择能力，为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前提。但是，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并在表面上加剧了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群体以及各层面的摩擦与冲突，导致社会整合程度不高，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的产生。

就难度来说，它不仅仅表现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也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处在迟发展效应的作用之下，处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之中，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形式是社会改革。而改革这种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即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即是要打破原来形成的不利于调动人们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利益格局。这种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承受力问题，便成为改革困难的最主要的根源。同时中国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传统，又使利益格局的调整成为难上加难的事情。基于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难度，我们就应当既要看到它充满希望的一面，又要看到它饱含痛苦的一面，在时间上，与其准备得短些，还不如准备得长些。在这里，关键是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就向度来说，涉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迄今为止的三个阶段中，向度是各不相同的。它表明，中国找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重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在1840~1949年的第一阶段，总的说，中国选择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这就是说，中国不是没有选择过资本主义道路和模式，而且是反复地选择过，时间延续了一百多年，不可谓不长，但这条路走不通。事实告诉人们，我们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照搬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充分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根据的。在1949~1978年的第二阶段，开始时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而误把它当作一般性的东西，曾盲目肯定了苏联模式的不少方面，按照这种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加重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分量。后来，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病逐渐暴露，也由于没有及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教训，中国开始寻求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这里，没有第一阶段，我们不会深切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而没有第二阶段，我们也不能真正体会到，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低效益的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以，在邓小平指出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之后，中国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之一。

读者可以看到,在本报告的各个专题报告中,都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体会到上述五个“度”。

(二)

“两个转变”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中国目前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和经验,面临的一切困难和挑战,无不与这两个转变相联系。

这种视角从“两个转变”的观点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提出: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说来,社会结构转型本身就包含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通常是从结构变动弹性较大的生产结构层次的变化向体制结构变革的过渡过程,但中国的体制改革是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程序进行的,并使结构转型进入加速期,所以,体制变革和政策导向对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两个转变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种视角论证说: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并非是一个过程。由于发展起点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等各种条件的限制,结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即便是中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达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程度,中国总体上也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依然处于结构转型时期的国家。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完备的但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更重要的是一个效率问题,而不是一个“发展程度”或“发展阶段”的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现实(不管增长速度多快也不可能),必然对体制转轨的程序、形式和时段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改革中速度观点和稳定观点的争论、单项突破观点和整体配套观点的争论以及各种关于改革力度和改革程序的争论,从深层次上说都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征对体制改革方式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异。

最后,关于这两个转变与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关系,这种视角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但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

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须的。两个转变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使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中国在进行各项政策选择时，都不能忽略“两个转变同时并进”这一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

把“两个转变同时并进”作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这两个转变既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的观点等，与我们不谋而合。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决定分别编写经济和社会两个报告，就是考虑到这两个转变的相互关系。第一个是名为《市场化改革整体推进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的“经济研究报告”，主要是从各个方面来研究经济体制转轨的；第二个是名为《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发展报告”，则主要是从各个方面来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而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读者可以看到，我们又一时刻也没有忘记它与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关系。

(三)

整体性和非均衡性的视角。本报告的理论部分，从整体性和非均衡性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个关系在前面两个视角中已得到体现。

显然，上述三种视角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二

摆在读者面前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是一份总结过去、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社会人文科学系列研究报告，旨在为我国走向21世纪的议程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内容上看，本报告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具有总报告的性质；后面九个部分均为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法制”、“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科学技术”、“人力资源与社会劳动”、“城市化”、“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社会问题”。从总体上说，我们选题的原则不是求全求大，面面俱到，而是要求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但又必须覆盖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些最重要、最有影响和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力争从这些方面勾画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总的面貌。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上研究的这些方面就是这样的问题。分别来说，我们要求每个报告不管写法如何，都要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指标体系、现实描述、动态分析、发展预测和对策建议；每个报告不管形式如何，都要这样那样地反映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的实际情况；每个

报告不管风格如何，都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实材料出发，让事实材料说话。我们提出：材料的真实性和方法的科学性是本报告的生命。每个报告既是整个系列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又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每个报告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可读性，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关于本系列研究报告写作成书的情况，我想着重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学校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撰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和撰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一样，是学校的决定。“社会发展报告”也和“经济研究报告”一样，得到我们尊敬的袁宝华老校长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他并担任本报告的顾问。本报告同样得到李文海校长的关心、支持和指导。本来“社会发展报告”应该由李文海校长任第一主编，我作为第二主编协助他工作。但他再三谦让，当我几次说我做主编不合适、会降低本报告的规格时，他坚持说我是社会学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并说这是学校的决定。这样就只好要求他为本报告题词。他的题词是：“保持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这一题词正好表达了我們编写“社会发展报告”的宗旨。直到最后，李文海校长才在袁宝华老校长的建议下，同意跟他一起担任本报告的顾问。分管我校科研工作的杜厚文副校长，在本报告的策划、写作直到出版的全过程中花了不少心血。

第二，它是我校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各院所集体努力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是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集中了这些方面的专家学者，理应更多地参与和研究实际的社会生活，为推动社会协调和持续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专家学者不但能够写出“经济研究报告”，而且也能写出“社会发展报告”。共有八个院系所的专家学者，主要是中青年学者参加了各专题的研究和写作。这八个院系所分别是：哲学系、法学院、人口学系、环境经济研究所、新闻系、劳动人事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社会学系。其中，有两个系还分别承担了两个专题。各有关院系所在接受专题后，选择了对该专题有研究的学者来承担，其中有的还专门成立了课题组。可以说，没有这种认真负责的集体努力，就没有本系列研究报告。同时，通过承担不同专题的学者之间的讨论交流，不仅达到了圆满完成本报告的现实目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更重要的、也是长远起作用的目的：将分散在各院系所的力量组织起来，发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人文科学专业门类齐全的优势，促进各学科专业间的相互渗透和优势互补，以提高社会人文科学的总体研究水平。十个系列研究报告的课题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的名字，分别附在各研究报告之后。

第三，它是各位执行主编分工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三位执行主编都参加了本系列研究报告的策划和框架设定等工作。除了共同的工作外，他们又有一定的分工。本报告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由我校科研处承担，这就是当时的科研处长毛佩琦教授担任本

报告三执行主编之一的原因。他做了许多繁琐的组织协调工作，由于参加的院系所多，参加的学者更多，且时有变动，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李德顺教授主要负责总论的审阅和修改。常务执行主编欧阳志远博士主要负责其他九个专题报告的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认真精神令人起敬，例如欧阳志远处理的文稿，一般要来回好几次，一稿一稿地改，一稿一稿地与课题组负责人及课题组商量，保证了质量。可以说，没有各位执行主编的工作，就没有本系列研究报告。正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主编审阅和修改了全部十个专题的报告，并最后定了稿。应当说明的是，尽管本报告实行的是主编负责制，但在个别子报告中，对执笔者实在不愿割爱之处，如果不涉及原则问题，如果涉及别的子报告的内容而该报告的作者没有异议的，主编一般予以尊重。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十二个重大关系之首。为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出谋献策，为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每个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类似的系列研究活动将在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坚持下去，成果将作为“社会发展报告”继续出版，预定每两年出版一本，有条件时将改为每年一本。本报告是第一本，涉及面不得不广一点。今后，主题将会更集中，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将会更密切，反映区域、地方和社区发展的色彩将会更明显。

这里，应当感谢河南郑州通联总公司为本次研究活动提供了资助。

同样，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密切配合，本系列研究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加班加点突击完成的。

由于水平所限，不当之处甚至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加以批评指正。

郑杭生

1995年11月25日

目 录

1	总论	1
2	法制	47
3	人口	99
4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129
5	教育	155
6	科学技术	196
7	人力资源与社会劳动	227
8	城市化	268
9	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	295
10	社会问题	319

总 论

1.1 理论模式：整体性主题 与非均衡性分析

本报告将对中国发展状况进行阐释，
但首先须对这种阐释方式作出阐释，
故此总论将先陈述我们的理论模式。

1.1.1 目标模式：发展的整体性 主题——世界与中国

当今世界有两大主题：一是和平，一是发展。

如果将两者作进一步比较，后者的意义要更为持久些，
更为根本些。人类争取和平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发展，就其一般涵义而言，指的是人类生存状况不断
获得改进的过程；就其特定涵义而言，指的是不发达民族
通过改变自身落后状况而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

1.1.1.1 整体性发展观的全球视野——从箱根到哥本哈根

由于人类的生存状况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因此,当人们企求社会获得发展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其间的整体性关系,不能不提出关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

关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已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与此相应,这一整体性要求,在当今许多有关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了出来。

(1) 关于发展问题的四次国际会议

1) 箱根会议

1960年,一次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箱根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日本现代化问题,但会议的实际意义已超出一国问题的范围。

在会议的讨论中,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研究精神。从讨论的方式上看,会议展现了一种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视野。与会者们各自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出发来阐述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使讨论本身具有了跨学科意义。从讨论的结论上看,会议提出了一套多指标的整体性衡量尺度。据M. B. 雅森记述,^[1]会议为“现代化”确立了八条标准,分别涉及人口与城市化程度、工商业发展水平、公民参与社会程度、个人自主性活动程度、大众科学教育发展水准、大众传播系统发展水准、社会制度化程度以及行政管理水平、单一社会内的整合程度以及不同社会间的相互影响水平。箱根会议的这种整体性研究精神,对于后来的发展问题讨论起了某种先导作用。

2) 基多会议

1979年8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在厄瓜多尔的基多举行。会后,该组织建议发展问题专家弗朗索瓦·佩鲁以补充报告的形式来总结此次会议的成果。这篇补充报告后来以专著形式出版,名为《新发展观》。

佩鲁在其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此次会议的主题:“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他总结了“二战”结束以来许多不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以往许多发展理论所共同具有的“经济主义”倾向,进而指出其发展的本义不仅要改善自己在经济方面的状况,而且要改善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状况。因此,真正的发展必定是一种整体性努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着的一种整体性成就,即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

3) 里约热内卢会议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183个国家派团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到会讲话,另外还有70个国际组织派专员参与此会。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阐释了一些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观念。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为此,大会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可持续发展”观念。所谓“可持续发展”,是这样一种发展,

即不仅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又不损害其后代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能力。这种发展观也表达了一种整体性要求:把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看作是一整体,把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与满足后代人的需求看作是一整体。大会在其《宣言》中宣告:“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第3项原则);“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第4项原则)。^[2]

4) 哥本哈根会议

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11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另外6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通过了包含十项承诺在内的大会《宣言》,同时还通过了为实现这些承诺而拟定的《行动纲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消除贫穷,减少失业,增加社会融合。其中的第一项、第二项侧重经济问题;第三项则涉及多方面问题,因为要增加社会融合就不仅要缩小其间的经济差距,而且要减少其间的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另外,在大会所作出的十项承诺中,摆在首位的,不是限于某一方面的单一目标,而是一个涵盖许多方面的整体性目标:“创造一个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的环境。”^[3]

纵观上述四次会议,不难发现有一个贯穿其间的共同主题,即发展的整体性主题。“箱根会议”从日本一国问题入手,广泛地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基多会议”则从整个不发达世界的发展实践出发,鲜明地提出了发展的整体性观念;“里约热内卢会议”强调当今人类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地球生态环境问题,注意维系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哥本哈根会议”则在试图解决贫穷与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考虑到社会的融合问题,以及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问题。

在这四次会议上,前两次与会者主要是专家学者,后两次与会者则主要是政府首脑。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发展的整体性主题的自觉意识,已从理论研究层次进入到实践操作层次,已由研究专家大声疾呼阶段进入到政府官员准备付诸实施阶段。发展的整体性主题,已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一种结论,而且也是政府运作的一种决策。

(2) 发展的整体性主题

1) 理论批评:经济主义

在思想进程中,一种新观念的出现通常要伴随着同老观念的激烈论争。整体性发展观也是如此,也是通过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尖锐批评而确立自己的研究视角的。

传统发展理论主要以传统发展经济学为代表,有新古典主义的,也有凯恩斯主义的,其中以盛行于50~60年代的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和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最为著名。整体性发展观则主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多会议的成果为代表,集中地体现在弗·佩鲁的补充报告——《新发展观》中。

后者批评前者，在研究发展这一涉及范围十分广阔的课题时，犯了以偏概全的“经济主义”错误。因为，前者在衡量社会发展时，偏执于经济增长尺度，仅以一系列表征物质财富的经济数字来编织涉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图景。后者对此批评道：这是见物不见人。

实际上，前者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大有问题的。二战以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曾被许多不发达国家所采用，借以指导它们自身的发展实践。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理论的实际效用是大有问题的：在非洲和南亚基本失败，在拉美成败参半，在东亚似乎获得了某些成功，出现了“四小龙”奇迹。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成功，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独特的社会结构，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国际背景密切相关。

2) 视角转换：人的全面发展

正是基于对上述传统发展理论陷入困境的认识，整体性发展观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视角，或者说是把其前辈理论的研究视角作了方向相反的转换，即提出发展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对发展问题的注意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工具领域中的各种根本变革。其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题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4]；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5]。

人与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从本质上说是整体性的。

从横向关系上看，人是社会的人，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就内涵而言，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集经济、政治、文化多种属性于一身。就外延而言，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通过各种协同关系和冲突关系而与其他许多人或亲或疏地联系在一起，有些表现为自觉的亲近，有些虽有相互背弃的主观意向，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互为条件的客观境地。

从纵向关系上看，人又是文化传统的载体，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背景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6]同时，人本身又是文化传统的创造者，或对已有文化传统进行因循性创造，即运用它的既定价值观念对现实事物进行创造性阐释；或对已有文化传统进行变革性创造，即当它的既定价值观念在现实中遭遇解释性危机时而对其本身进行创造性重构。今人所创造出来的新东西也将汇入民族文化传统中而留给后人。

可见，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仅同其周围社会环境联结在一起，而且同其前后文化传统联结在一起；当把这样的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着眼点时，这种发展所追求的必然是一种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性进步。

这种整体性进步，包括经济增长，但不归结为经济增长。它还包括社会其他许多方